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在资本主义的复杂环境与早期女权运动的思想激荡下逐步成型,并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对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引妇女挣脱枷锁、迈向平等自由的核心思想灯塔。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形成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对妇女问题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妇女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分析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妇女应该被赋予的社会权利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路径等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妇女解放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前人理论的批判与继承上,而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创。他们在深入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启蒙学说以及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演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整理与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存在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并非自古低于男性,扩充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关于妇女地位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是人类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产工具的出现为妇女参加工作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反而加大了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在欧洲,部分地区的女性群体开展反压迫运动,为

争取应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而斗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女性群体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受此影响,将目光投向妇女解放议题。

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标志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来临。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和巨额财富的利益推动下,机械化大生产将妇女和儿童也纳入工厂体系,使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只要是女性,无论是资本家的妻子还是普通男性的妻子,都被视为是附属品,受到男性的歧视与剥削。

1791年9月,著名的女权活动家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的《女权宣言》提出17条废除男性特权的要求,标志着完整女权思想的诞生,也标志着西方女权运动拉开序幕。次年,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的《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要求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该书被称为“英美女权主义历史上的奠基之作”。在18世纪晚期,女性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只能以婚姻作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之一。该书作者意识到,女性的生存能力不足,社会地位低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社会结构性压迫下形成的,女性不得不陷入“第二性”的境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当时受到先进妇女的追捧,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在萌芽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女工的精神与肉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无尽的摧残后,开始关注无产阶级女工的生存境况,并且开始思考妇女解放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分析中窥探到早期马克思对妇女异化和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和解决途径的诸多关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主不仅不会因为女工的性别给予她较为轻松的工作,反而加重对女工人的剥削,给她不及男性工人一半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女性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她们遭受的都是程度更深的异化,表现出的便是更为沉重的压迫。

首次出版于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其中对女工的生存状况做出了特别研究,并且用一系列直观数据说明了女工的工厂生产中占有极大需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深刻揭示女工在工厂里所遭受的压迫,向社会揭露了无产阶级女工的现实困境,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典型课题。由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开始萌芽。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更是无产阶级战斗的宣言,同时谱写了女性解放的宣言书。它宣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强调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妇女解放只是空谈;只有消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女性压迫才会消失。该著作首先强调无产阶级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的,自然女性群体也包括在

内,将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一部分纳入无产阶级解放中来。而不是将女性解放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放入西方学者传统的男女对立的视角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进一步深化着妇女解放的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熟的标志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出版。该著作是恩格斯第一次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妇女地位嬗变问题和研究妇女解放意义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最终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里,恩格斯首先借助了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指出妇女的压迫不是自古就有的,反而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高。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女性地位的最终改变和彻底解放需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方式来实现。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讨了现代个体家庭的发展前景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为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指导思想,推动着女性在各个阶段追求自身权利。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结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成功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坚定保护妇女各项权益,促进当代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

(一)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随着十月革命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其逐渐民族化、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过程。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将妇女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妇女事业的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保障。

在妇女解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妇女解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基础,在实践上将思想与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二)坚持保障妇女权益

传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意识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而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理念在短时间内很难清除,因此,必须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来保护妇女的权益,将性别意识纳入妇女保障制度中,尊重妇女,推进妇女的全面发展,促进男女平等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保障妇女权益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使妇女掌握生产资料,将妇女解放的实践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在一起,通过“妇女解放—妇女教育—妇女发展”的路径推动减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显著提高了妇女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质生产力助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 于洁卿

随着科技数字化及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发展的产物改变了生产方式,还对社会结构、环境保护和全球合作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及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思路,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一、凸显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

与传统生产力侧重数量扩张不同,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通过科技创新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来推动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攻关、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不同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来促进互补与协作,缩小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实现了资源共享,保障了全体劳动者的发展机会。协调发展强调整体布局与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要求统筹区域、产业和要素配置,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在绿色发展的框架下,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广清洁能源、发展绿色制造、建设循环经济等手段,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系统承载力,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现实支撑;开发利用通过技术、资本和人才的国际流动,使新质生产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提升了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化推动了创新成果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促进了跨国合作和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与创新链体系,不仅提升了自主创新的协同性,也增强了应对外部

不确定性的韧性和能力,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共享发展理念下,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劳动者可以更加平等地享受新科技带来的好处,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发展空间,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推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深刻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对现有生产关系提出了重塑要求。与传统生产关系强调“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同,新质生产力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更加注重要素之间的协同整合与人力资源的主导作用。在当前“科技一人才一创新”驱动模式下,生产组织方式呈现出平台化趋势,数字劳动、非物质劳动成为主导劳动形态,这种结构的变迁对生产关系产生了强烈的重构压力。与此同时,灵活生产分配机制、岗位设置与决策结构也在悄然变化,劳动者的参与度和创造性成为关键指标,催生出更为灵活、开放、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为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应做到“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通过构建适应性强、协调性高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不仅有助于疏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更能形成制度层面的持续驱动力,为“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结构性保障。

三、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绿色技术

等技术基础,突破传统生产要素局限,拓展了国际分工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延展产业链条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为不同国家提供发展新动能,促进全球利益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它可以缓解资源竞争,推动公平分配,为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现实基础。例如,新质生产力倡导的智能化与网络化可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展低碳环保产业。在技术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焦点的今天,发达国家不再垄断全部高新技术的开发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诸多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推动国际力量格局趋于平衡。新质生产力以其开放性特征,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平台,催生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全球化遭遇保护主义回潮和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地缘分割,使“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成为可能路径。通过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和产业链韧性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可以更主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构建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结构。尤其在“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推动下,中国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转型、人才交流合作等多维度与“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互利合作关系,实质上正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深化全球产业链合作,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这种合作不仅增强了各国家的战略互信,也为摆脱全球性发展困境提供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变革力量,更蕴含着跨越发展鸿沟、塑造公平秩序的价值导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新质生产力强化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协调逻辑,使全球发展进入以和平、合作、共赢为基本内核的新阶段。通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倡导全球生产关系的重构,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实现人类文明新跃升的重要引擎。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物候意象”到“音响符号” ——《淮南子·天文训》节气内涵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艺术表达

■ 余松阳

一、“物候意象”与“音响符号”的概念界定及转化本质

“物候”指大自然中随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如动物蛰眠迁徙、植物萌芽凋落、冰霜凝结消融等,被纳入二十四节气体系后,经文人以联想、隐喻、象征手法升华“物候意象”,成为承载情感与文化记忆的表意载体,兼具自然客观性与文化主观性。“音响符号”是以声音为物质载体、传递特定意义的符号系统,核心是声音脱离物理振动属性,被赋予指向性与文化意义。二者的转化本质是符号载体从“多感官自然现象”转向“单感官声音”,表意逻辑从“隐喻联想”转向“直接意义匹配”,构成“自然—文化符号系统”的完整转化链条。

二、《淮南子·天文训》中的节气内涵

二十四节气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始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此前《尚书》《吕氏春秋》对节气的记载零散且体系尚未统一,该书首次以北斗斗柄运行轨迹为核心依据,构建“天文—音律—节气”联动体系,融合太阳运行、月亮运行、二十八星宿度数等数据,形成兼具实用性与科学性的历法体系。淮南国都城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因地处秦岭—淮河分界线中点,四季分明,物候典型,成为节气研究核心地域;加之西汉初期寿春是江淮文化学术中心,淮南王刘安汇聚顶尖学者,为节气研究提供条件。此后二十四节气于公元前104年纳入国家历法,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涵可分为三类:季节标识类(如冬至、立春),气候特征类(如大暑、雨水),物候类(如惊蛰、芒种),还衍生出立春“咬春”,清明祭祖、冬至“数九”等民俗,从天文历法工具升华为文化符号体系。

三、节气内涵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艺术表达

自1915年赵元任《和平进行曲》揭开

冬”点明物候特征与情感基调,让文学意境与音响结构深度融合,赋予节气“诗意化音响表达”的新形态。

进入21世纪,这一题材的创作更打破地域与风格边界,呈现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国际对话的多元格局。张舒文2016年创作、2021年出版的《二十四节气》,既以中国民族调式为根基,又融入西方24个大小调与经典音乐体裁,24首节气小品与终曲《节气诗曲》,虽未完全覆盖二十四节气,却以农历十二月节令与乡俗为创作主线,用《元宵花灯》《端午赛龙舟屈原》《春节跳狮子》等12首乐曲搭建起“节令—民俗—音响”的关联框架。他通过快速音阶模拟花灯摇曳、借景唢呐音色还原热闹氛围、融入锣鼓节奏复刻节庆场景,以“民俗场景音响化”的方式,完成了“物候意象”转化的初步尝试,为后续创作奠定基础。

随着中国钢琴创作的技法成熟与文化表达深化,节气题材的艺术呈现从“场景模拟”走向“体系化构建”,廖胜京1999年出版的《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中国节令风情》成为关键突破——这部首次完全覆盖二十四节气的钢琴套曲,以其独创的“中国五声音阶同主音横向综合理论”为内核,为每个节气匹配专属调式。《立春·新春佳节》用C商宫调式传递万物复苏的喜庆,《雨水·春雨淅沥》以连续分解和弦模拟雨滴绵绵,让调式本身成为诠释节气内涵的“音响符号”,实现了技法逻辑与文化表意的高度统一。

在体系化实践之外,节气题材的表达还朝着“诗意化”维度延伸,林华2025年推出的《二十四节气格律诗曲咏怀》便是典型代表。他以复调技法为骨架,又为每首作品搭配“八字格律”的诗意图标题——如《惊蛰·喜闻春雷》以“惊天一声蛇虫动急雨电光驱寒

(作者单位:安徽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演进与理论创新

■ 甘金喜

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劳动形态的嬗变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线索。当数字技术重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全链条,劳动价值论这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石,正面临新的阐释需求与实践挑战。本文试图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语境中,重新锚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坐标,揭示其当代演进逻辑,并探索理论创新的可能路径。

一、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适配性

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质是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渗透。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数据资本化等新形态,使劳动从“工厂围墙”延伸至社会全领域,呈现出“去工业化”“非物质化”与“算法化”的复合特征。国际劳工组织2023年数据显示,全球数字平台从业者规模突破4.3亿,中国贡献了超30%的份额。这种转型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提出双重挑战:数字劳动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其价值创造机制能否被劳动二重性原理所涵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来源与资本化路径又该如何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劳动价值论,以“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为核心,通过剩余价值论揭露资本剥削的本质。但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已突破工业时代的物质生产范畴——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内容生产、外卖骑手的算法调度劳动、数据标注员的“幽灵劳动”,均呈现“产消合一”特征。这些新现象既延续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逻辑,又催生了新的价值增殖机制,要求我们在坚持劳动价值论方法论的基础上,完成从物质生产到社会生产的理论跃迁。

二、数字劳动的价值生成:从用户行为到数据资本

数字劳动的价值生成过程,本质是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具体展开。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对象从物质资源转向数据资源,劳动过程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但价值创造的源泉始终是人类劳动的时间凝结。

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用户每日上传的海量内容(Facebook用户日均3.5亿张照片),浏览记录与互动行为,构成了原始数据资源。这些看似“无偿”的活动,实则是数字劳动的起点——用户从单纯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其日常行为成为数据生产的原材料。剑桥分析公司丑闻暴露的,正是用户劳动成果被资本窃取的典型案例:8700万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操控,其价值根源正是用户长期劳动积淀的数据资产。

原始数据需经专业劳动处理才能转化为资本增值要素。菲律宾数据标注员图像训练自动驾驶算法、爱尔兰数据中心工程师维护服务器集群、华虹衡量化分析师挖掘金融行为模式——这类劳动既包含低技能重复工作,也包含高智能创造性活动。以亚马逊机械土耳其平台为例,完成1000张图片标注需支付2美元报酬,但经算法处理后数据价值增长超200倍,这直接印证了劳动复杂程度对价值增量的决定性作用。

数据价值的最终实现,依赖平台企业的垄断权力。谷歌占据全球92%搜索引擎份额,其广告定价权源于独占用户搜索行为数据;腾讯凭借社交媒体闭环构建商业生态护城河。此类垄断租金包含双重性质:一部分体现数据处理劳动创造的真价值,另一部分则属于排他性占有所产生的虚拟收益。这与马克思分析矿山地租时揭示的“所有权收益”具有同构性——资本通过控制关键生产要素,将社会劳动创造的价值部分据为己有。

三、算法控制与劳动过程的再造

数字平台借助算法技术重构劳动过程,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控制逻辑演进至新阶段。传统工厂的物理监控转变为算法隐形支配,劳动价值论面临三重现实挑战:必要劳动时间如何被算法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标准如何被算法重构?剩余价值如何通过算法实现隐蔽提取?

以外卖配送系统为例,算法通过实时路径优化将送餐时限压缩至人类生理极限边缘。美团骑手调研数据显示,2019~2022年单均配送时间减少28%,但事故率上升41%。这种时间压榨本质是算法驱动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其残酷性远超泰勒制流水线——劳动者不仅被要求提高效率,更被算法推至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极限。

算法更通过定义“达标”标准重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网约车平台以接单率定义服务等级,内容审核岗以错误率评判专业能力,迫使劳动者为维持“达标”状态主动延长工时。印度零工工作者日均主动延长工时3.2小时,当85%以上配送员用户评分维系4.8星水平,算法悄然将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普遍社会标准。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算法定义,使资本得以持续降低单位商品价值,同时扩大

剩余价值理论回应三重变革: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隐形强制(算法管理系统代替传统监工),相对剩余价值实现精细化调控(大数据分析根据个别劳动时间压缩超越物理极限),超额剩余价值呈现垄断性积累(平台凭借数据独占权构筑价值获取壁垒)。例如,仓库机器人通过订单量预测优化货架布局,物流公司依据交通数据动态规划运输路线,制造业借传感器实现零库存生产——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算法耗尽时,相对剩余价值将获得新引擎。

阶级分析需纳入数字维度。数字无产阶级成为新型劳动主体,其劳动具有形式自由与实质控制的双重性;技术管理阶层扮演关键中介角色,既依赖平台资本获取高薪,又为雇佣劳动者受制于股东意志;数据资产阶级占据支配顶层,通过制定平台规则与分配机制,